

当代上海研究所 编

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

——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当代上海研究所 编

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

——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: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/当代
上海研究所编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
ISBN 978-7-208-06983-1

I. 口... II. 当... III. 口述历史学—学术会议—文集
IV. KO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8307 号

责任编辑 孙 瑜 刘英红

封面设计 王小阳

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

——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

当代上海研究所 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5.5 插页 4 字数 226,000

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6983-1/K·1330

定价 25.00 元

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

——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

目 录

口述历史——与历史对话·····	叶永烈(001)
推进中国口述史的建设·····	苏智良(009)
口述史学——一种全新的治史方法 ·····	
····· 马宝妮 陈卫鹏 郑彦卿(015)	
关于口述史实践的思考·····	陈伍国(021)
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、 法律问题·····	胡志伟(028)
关于口述历史的五点看法·····	丁 东(047)
浅谈口述史真实性问题·····	朱元石(051)
再谈有关口述史的一些问题·····	程中原(060)
口述历史工作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·····	王 炎(064)
当代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 展望·····	周新国 丁慧超(080)
口述历史在台湾的发展·····	沈怀玉(092)
四川口述史工作:感受与探讨 ·····	章玉钧(112)
四川口述历史之发轫·····	张家钊(120)

口述历史实务谈·····	沈怀玉(128)
采访胡道静先生·····	袁燮铭(157)
军政人物的访谈经验·····	张 力(161)
倾听她们的声音:从邵梦兰女士的访问纪录说起 ·····	游鉴明(171)
他乡的经验: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口述访谈 ·····	许雪姬(177)
来自社会底层的口述历史·····	谭继和(213)
政协文史资料与口述史·····	方兆麟(217)
传记文学、口述历史与当代史研究 ·····	胡志伟(221)
口述历史与近现代文物鉴定·····	段 炼(235)
后记·····	(243)

口述历史——与历史对话

叶永烈

当代上海研究所主办的首届“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”在上海举行，我也忝陪其中。其实，我作为纪实文学作家，只是因为这纪实之“实”乃是史实，而我又常通过采访当事人了解史实，也就与口述历史有了些关联。

我最早接触的口述历史著作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。记得那是“文革”刚刚过去，我读到“内部出版”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。此后，又读到唐德刚教授整理的李宗仁口述的回忆录。后来，得知唐教授为张学良将军整理口述回忆录。我很敬佩也很羡慕唐德刚先生的眼光和工作条件，能够让中国当代这么三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在晚年口述历史。

2001年5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艺术为首批“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。这“人类口头遗产”与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概念，其实完全适用于口述历史。挖掘历史老人头脑中的记忆，化为口述历史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抢救历史，抢救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香港凤凰卫视设有“口述历史”专栏，很多节目十分精彩，主持人曹景行邀请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当年，留下了宝贵的口述历史录像资料。

宋美龄以106岁的高龄离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世界，没有留下一字回忆录。有人赞赏宋美龄的清醒和明智，而我却为宋美龄惋惜，因为宋美龄的阅历如此丰富，而晚年又有的是时间，为什么不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呢？在我看来，没有人能够“撬”开宋美龄的嘴巴，是历史的遗憾！

我是在无意之中进入这一领域的。作为当代人写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，鉴于有关档案往往藏之深阁，我只能尽量从当事人的口

001

述中获取第一手史实。不管光彩还是肮脏,都是历史。在我看来,不论是历史的功臣还是罪人,只要是历史的当事人,只要亲见、亲闻、亲历历史,都值得采访。

历史向来是胜利者写的。但是,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。历史作为科学是建立在事实、真实的基础之上的。纪实文学作家要有胆有识,步入雷区,追寻历史真相。历史是多方面的,立体的。我游访于三教九流之中,从毛泽东秘书到政界要人,从“右派头目”到“文革”红人,从乒乓名将到“9·11”事件亲历者。正因为这样,不论是林彪集团的主犯之一陈伯达,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王力,还是“托派领袖”郑超麟,还有处于争议之中的千家驹、戴厚英、何智丽、庄则栋……我都充分尊重,细细倾听他们的口述。

对于“抢救”二字,我深有感触。我常常是在医院采访风烛残年的历史老人。记得,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病房里采访“右派头目”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,不久她就撒手西去;我在北京陆军医院采访章伯钧、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之后回到上海,见到中央电视台播出他的追悼会;我采访中共早年活动家罗章龙是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;采访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王力,正值他身患癌症的时刻……

002

倾听历史老人的口述,仿佛穿越时光隧道,置身于早已消逝的时代洪流之中。口述历史的可贵,不仅在于弥补档案的不足,更贵贵的还在于揭露历史的真相。有人曾说,历史教科书是一种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,而不是真实历史。这话有可取之处,但是也有偏颇之意。鲁迅曾经这么说及,由于“正史”“涂饰太厚,废说太多,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”;但“如看野史和杂记,可更容易了。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”。口述历史不是史官之作,常常被视为“野史”,其实,口述历史更少“涂饰”,也就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

当然,从作家的角度来看,口述历史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丰富而又生动的细节。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,一是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,二是充满丰富的细节。细节不仅对于小说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,而且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来说也是如此,只有充满细节,才能使读者如入其境,如闻其声。这是纪实文学与那些干瘪的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区别,不仅在于揭示历史的真实,还在于细节生动所带来的欲罢不能的强烈可读性。

采访历史当事人时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请他们回忆细节——这是与查阅档案的最大的不同。比如，我在采访曾经担任陈独秀秘书多年的郑超麟先生时，请他回忆陈独秀的习惯动作、嗜好、衣着、饮食以及写作习惯、讲话习惯。郑超麟先生笑道，他接待过许多中共党史专家，他们从来不问这些。

口述历史既然要靠当事人口述，那么当事人的状态直接关系到口述历史的质量。在我看来，口述历史的最佳人选应具备三个条件：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；二是记忆力好；三是口头表达能力强。

在这三个条件之中，第一个条件是前提，是最重要的。

记忆力也是重要条件。然而，口述历史者往往是饱经风霜的耄耋老人，往往记忆力差，需要采访者不断给予提示。当然，也有记忆力极好的，那当然求之不得。我在采访八十多岁的陈伯达时，发现他连隔三差五前来给他看病的医生的名字都记不住，但是一说起童年，记忆非常清晰。最令我吃惊的是，他回忆年轻时写了一首七绝投寄给郁达夫，他当即默写在我的采访本上。然后他说，郁达夫把每句诗圈去一个字，变成六言，诗就显得非常精练。他随即逐行圈去一个字……

口述能力，也就是表达能力。我发现，口述者最好是教师出身，或者政治家、作家出身。做过教师，口头表达能力通常不错。政治家经常作大报告，作家善于描述，一般都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。我在采访王力、陈云夫人于若木、公安部部长王芳时，发现他们思路清晰，口述有条有理，是很好的采访对象。何智丽虽然年轻，但是口头表达能力却不算好，一件极其精彩的事，她只用两三句话就讲完了。所以遭遇何智丽这样的对象，我必须不断追问，把细节一点点追出来，问出来。

从事口述历史工作，其实也就是一项挖掘历史老人头脑中的记忆宝库的工程。一定要有锐利的目光，一定要讲究技巧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，一定要有细致的工作态度。

我的工作习惯是一定要录音。因为笔记毕竟不能完全跟上口述的速度，有了录音，可以反复地听，避免遗漏，也避免讹误。就连最初不同意录音的陈伯达、关锋，经我再三坚持，还是同意了录音。至今，我保存的一千多盘录音磁带，成为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。当然，有条件的进行录像更好。

我希望口述历史者是重量级的。但是，也有的小人物，虽然一生平平，但是经历了某一事件，也很值得就这一事件进行口述。例如，秦桂贞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，她的前半生是做保姆，后半生是做幼儿园的保育员。由于她与江青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过密切接触，在“文革”中又因此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，我多次采访了她，获得诸多重要的口述资料。

在进行口述历史采访时，也要注意避免陷入误区：

一是由于年代久远产生记忆上的错误；

二是故意回避；

三是口述者护短。

比如，我写《红色的起点》时，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十三位代表都已去世，惟一健在的当事人，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。她是茅盾的姑母，当时已是 91 岁高龄。我在北京三次访问了她。中共“一大”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，就是她的主意。

004

关于这些，她都谈得很清楚，提供了重要的口述史料。

可是，王会悟谈及中共“一大”在上海召开时，却回忆“翻译杨明斋坐在门口附近望风”。

我经查证得知，在中共“一大”召开时，杨明斋正在苏联出席会议，根本不在上海，也就谈不上“在门口附近望风”。

王会悟显然是因为事隔七十年，记忆模糊，造成口述失误。

又如，我在写作《毛泽东之初》时，写及红军长征前夜，曾派人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，商议“借路”。为此，我查阅了何长工的回忆录。回忆录，从某种意义上是口述历史的记录。

最初，我查到的是何长工在 1980 年发表的回忆录，说是从红军阵地上抬出一顶大轿，轿上坐着他，朝着陈济棠的司令部走去。

不久，我又查到何长工后来发表的回忆录，说是从红军阵地上抬出的是两顶大轿，一顶坐着他，一顶坐着潘汉年。

同样是何长工，为什么写的回忆录不一样呢？

显然，这不是因为记忆失误，主要是 1980 年时，潘汉年的冤案尚未平反，何长工出于政治上的原因，不便提及另一顶大轿。

我采访过罗章龙。根据他的回忆，他出席过中共“二大”，可是在各

种党史书籍上，中共“二大”的出席者名单上却没有他！罗章龙说，那些名单是后来追记的，把他的名字删掉了。

还有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可以用“记忆犹新”四个字来形容，而且甚至还有录像带、录音带为证，居然也会发生失误！

就拿我写的《江青传》来说，在这书初版中，是写成伍修权宣读对江青的判决。这是依据伍修权的回忆录：

后半部分由我接着宣读。这一部分的最后，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。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，这时也沉不住气了，当我刚念到“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”时，还没等我念出“缓期二年”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……^①

根据伍修权的回忆，对于江青的判决，是他宣布的。

然而，当《江青传》的初稿《蓝苹在上海》在1988年第7期《法制文学选刊》发表后，收到江华秘书张维1988年8月16日的来信。他提出相反的意见。他指出：

《法制文学选刊》编辑部：

看了贵刊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上登载的报告文学《蓝苹在上海》，觉得此文结尾部分“精彩的最后一幕闹剧”中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的宣判情况，与事实不大相符，我向江华同志作了了解，并查阅了审判记录。现将事实真相寄上，请予登载，以正视听；并请转告此文原载刊物《青春丛刊》以及作者叶永烈同志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，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被告公开宣告判决，判决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由江华庭长宣读，伍修权副庭长只宣读了判决书中属于个人罪的部分。对十名主犯的判决是由江华庭长而不是由伍修权副庭长宣读的。

在宣判时，江华庭长有意地放慢速度，想使这举世瞩目的严正判决更加凝重。当念到“判决被告人江青死刑……”时，作了一个

^① 伍修权：《往事沧桑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26页。

停顿,此时法警准备给江青戴手铐。但江青一听到死刑两个字,便歇斯底里地发作了,她边喊叫边往下溜,法警好不容易把她拉起来铐上手铐。

江华庭长继续宣读“……缓期二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”,江青这时什么都听不进,她继续哭闹,并喊口号,扰乱法庭。

为了不影响整个判决,副庭长伍修权责令江青退出法庭。由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法庭,带到候审室。

在押解过程中,江青作了最后的表演,她边走边喊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、“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”等口号。

到候审室后,她还赖在地上耍泼。直到法警告诉她“缓期二年执行”时,才安静下来。

原来江青听到“死刑”二字后,乱了方寸,处于高度紧张和疯狂状态,根本没有听到最后的判决,当她知道并不立即执行时,便老实了。

叶永烈同志的报告文学,说对江青的判决是伍修权同志宣读的。当然,他是根据郑君理夫人黄晨的回忆,但黄晨的回忆是不准确的。去年,我在《大千世界》的一篇文章里也看到了这样的错误的说法。如不纠正,将来还会进一步流传。

关于特别法庭的审判,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,中央电视台作了录像,还有许多新闻单位进行了录音记录,有案可查。而且这一案件的判决到现在还不到八年的时间,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,照说是不应该以讹传讹的。

希望贵刊依照事实对错误的说法予以澄清。请回信。

此致

敬礼

江华同志秘书 张维

1988年8月16日

不言而喻,这么近的事,是伍修权“记”错了!我根据江华秘书的来信,又查了有关资料,在《江青传》中作了修改。

至于被采访人的“护短”现象,则更为常见。尽管陈伯达跟我谈话

时,已有言在先,“老年人常常容易自己护短”,而他的谈话中确实也存在着为自己护短。

人对于数字的记忆最差。被采访者谈及往事时,常常记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,或者只能说个大概,或者说错了。所以,在纪实文学中写及事件发生的年月日时,总要找参考书加以核对。

在整理口述历史时,需要查对年月日,查对档案以及有关历史文献,以求尽量校正口述者的记忆失误。

例如,我写《傅雷之死》时,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,幸亏从公安部门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,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,更正了种种误传——就连傅雷之子傅聪、傅敏,就连当时惟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的口述情况,都与档案不符。

我在1986年第2期《报告文学》杂志发表的《傅雷之死》,被选入《历史在这里沉思》等书。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,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,只是改了标题——《傅聪之父傅雷之死》,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。此文在日本被译成日文发表。

傅雷夫妇在“文革”中双双同时自杀,曾震撼了海内外。

当时,惟一与他们同住的是保姆周菊娣。我与周菊娣作了多次长谈,并访问了傅雷之子傅聪、傅敏及傅雷的妻兄朱人秀。

照理,这样的采访是够详细的了。我写好初稿后,幸亏没有马上付梓。

为了准确起见,我去公安部门查阅了傅雷死亡档案。保姆说傅雷是服毒自杀,而死亡档案上法医验尸报告及所附照片却说是自缢身亡。

我再度访问了保姆,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,终于弄清真相:

傅雷确系自缢身亡。当保姆进入现场时,傅雷尸体已掉落下来,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,误以为服毒身亡。

验尸报告指出,傅雷颈部有马蹄沟。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,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……

公安部门告诉我,傅雷因属著名人物,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,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——这事,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,只说尸体送火葬场,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……

查阅档案,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。

起初,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——因为他们一直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。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,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,他们信服了。

这件事也使我在采访中从此更注意依靠档案,发挥档案的作用。当然,周菊娣的口述不准确,是由于她当时了解的情况不准确。

我加入了口述历史工作者的队伍,我愿向历史学家请教,与历史学家结盟。

(本文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)

推进中国口述史的建设

苏智良

口述史是一种生动、古老而又新兴的史学方法,通过访谈、口述搜集历史资料,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,均古已有之。甚至可以说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,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。但是,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(Oral History),即历史工作者利用笔录、录音或录影的方式记录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整理的口传记忆文献,作为一个专门的史学分支,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。1948年,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·芮文斯(Allen Nevins),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,用以记录、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。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,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、生动的资料。直到现在,哥伦比亚大学仍是世界口述史的重镇。他们对李宗仁、顾维钧、胡适、张学良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学者完成的口述计划,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,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在我国,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《红旗飘飘》、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等历史回忆录,也是颇具规模的口述历史。

口述史的方法,对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,对底层社会的研究,对方志的撰写等,均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尽管近代以来,报刊、档案资料已非常丰富,但仍有许多缺陷和盲点。如政治领域,政治内幕多不见诸记载,需要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讲述秘闻。战争时期,战场瞬息万变,许多秘闻如果没有参与者的讲述,就会永远无人知晓。同样,即使是在社会、文化领域,亲历者的口述也会提供诸多细节。

口述史的基础就是具有大批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参与者与见证人,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“活史料”。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。城市拥有大批参与当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活动的亲历者,诸如政权更迭中的参与者、政治运动中的主政者与受害者。一座工厂、一家商店的经营

者,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等,均是弥足珍贵的史料。这些鲜活的事例将告诉你更真实的“事实”。政治昌明,也是口述史兴旺的重要条件,否则,心有余悸,见证人就不敢或不愿讲述。当前的任务是要抢救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口头历史,将其视为不再抢救就会从人类文明中永远消亡的精神遗产。

口述史是史学价值观念的革新,是一种新的视角、新的理念。传统史学讲述的是“创造历史”的人与事,而口述史更多的是“事件”对个人的影响,“事件”成为了叙事的背景。口述史具有强烈的民间化色彩。传统史学较少注意民众生活史,而口述史使“草根”的底层社会史变得鲜活与丰富起来。同样,记录民众女性史,在传统社会,女性的历史几乎是缺失的、被忽视的,口述史将提供大量女人的真实故事。口述史试图通过小叙事的叙事形式,以对大叙事的历史进行证实或证伪,从平凡的生命个体、日常生活的视角,来解构大叙事历史是如何被塑造的。

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,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活动。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,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,但他不一定具有历史工作者的素养。在其讲述的时候,可能受记忆因素、情绪因素、选择因素的影响,讲了一些,也漏了一些,甚至讲了枝节的,漏了关键的,讲了感兴趣的,回避了不堪回首的;讲对了一些,也讲错了一些。张冠李戴、前后倒置,以及片面主观、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此情况下,访问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,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,通过提问、讨论、串联、整理,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,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,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。

当然,与其他历史方法或路径一样,口述史也有长处与缺陷。口述史的长处,是可以找到大量丰富、鲜活的事例,将生命体验融入历史,并突出人的作用。缺陷是个人的叙述不可能是完整的“历史证词”,因为时间久远,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,如记错了时间、人物张冠李戴、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,因之口述资料很容易产生偏见。不仅如此,受访者还有可能删除某些事实,甚至歪曲历史。当然,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,历史的编纂者也有选择性记述的问题。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,文字书写的史书就一定完全真实吗?最佳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、互为参照,彼此印证,两者相得益彰,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。

在抗战研究领域,口述史虽已推广,但开展的力度、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,丰富的抗战口述史料正面临着永远流失的境地。

抗战史领域进行口述史研究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首先,通过采访抗战“三亲”者,让他们来直接叙述和呈现抗战历史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片段。这种抗战史当事人的诉说和表白,具有直接性、真实性(客观性)和具体性,它没有经历史研究主体的二度叙述,因此往往能够更好地反映抗战史的许多“实态”,是一种“实态史”。其次,由于受访者的角色是抗战的亲历者或战争灾难的受害者等,他们的历史叙述常常因之带有或喜或悲、或恨或爱、或荣或辱的丰富情感和复杂心理,与通过文献和档案所揭示反映的历史相比,口述史多具生动性和感人性,它虽然不如史家撰写的历史那样全面、系统及富于理性色彩,但却能给人们提供更生动和更情感化的抗战历史认识途径。而情感是历史认识的途径之一,真正的历史不光是理性的历史,还是有情感的历史。通过这种历史认识方式所展现的抗战史能够给人鲜活的感觉,因而被视为是“活的历史”。

当然在访问中,要处理好访谈人与受访者的关系。事实上,访谈人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。这在访问历史受害者之类受访者时,尤须注意。

“慰安妇”是战时日本国家实施的军队性奴隶制度,迫使40万妇女成为性奴隶,是一种“反人类”罪。这一制度对受害者的摧残,超过人类所能的想象。但日本军队销毁档案,日本政府隐瞒事实真相,至今仍不开放档案。在这种情况下,口述史显得极为重要。通过口述史记录战争对人性的摧残,体验战争的残酷。我们在中国各地寻访到近百位受害者,记录她们的苦难曲折的经历,同时试图用其他材料去印证。如山西太原的万爱花,在孟县成为日军性奴隶,她在第一次从炮楼中逃跑时,曾将日军从村民侯大兔家抢来的棉被再拿回村给了侯家,为证实此事,我们幸运地寻访到侯大兔老人。亚洲各地对“慰安妇”的田野调查,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,还原历史真相,揭露战争的罪恶让世人所知。

口述调查有时也需持之以恒。对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调查,我们至今已坚持了13年。例如湖北的袁竹林是我接触较早的一个原“慰安妇”幸存者,1998年在多伦多由香港作家李碧华介绍认识。袁竹林后来组织了家庭,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曾因此被劳动教养,家庭也惨遭